

也是科技考古—— 乾隆朝澄泥硯研製工程始末

■ 嵇若昕

唐宋時期士子熟悉的澄泥硯，至清初讀書人已漸感陌生。清高宗（1736-1795 在位）於乾隆四十年（1775）開始關注澄泥硯，在參閱宋初張洎纂輯的《賈氏譚錄》書中記載後，開始了澄泥硯的研製工程。皇帝率領于敏中、山西巡撫、蘇州織造等朝野大小官員與相關匠役，從初期的摸索、實驗，成功燒製出滿意的成品後，遂一再照例成做，最後於乾隆五十五年（1790）皇帝傳旨罷停。前後歷經十六年的時光，為今人留下不少成品，亦可謂是一項科技考古的歷程。本文藉豐富的文獻資料，敘述研製工程進行始末，隨文配圖之文物，不論古硯和宮中檔皆為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品，藉此一併說明。

在東亞漢字文化圈中，筆墨紙硯總被讀書人視為文房四寶，其中又以硯最受文人推崇。自古以來，製硯質材有陶瓷、玉石、金屬、漆木與紙硯，其中以陶與石為大宗。這些製硯材料，或見於古人筆記，或見於歷代傳世器，上世紀的考古出土文物中更屢屢現蹤。

宋代以來，文人總以擁有嘉研（硯）為榮，漢化甚深的乾隆皇帝更不在話下。他自登基為帝後，承繼了紫禁城內數百年積累的宮廷文物，他在《西清硯譜》書前序言即指出：「內府硯頗夥，或傳自勝朝，或奔自國初。」其中不乏各式古名硯，例如一方歸屬抗元名相文天祥（1236-1283）的〈端石玉帶生硯〉（圖1），至今仍是國立故宮博物院（以下簡稱「臺北故宮」）典藏的《西清硯譜》名硯之一；乾隆三十九年（1774）清高宗在「檢閱懋勤（殿）舊物」時發現它，欣喜之餘或也不免嘆曰：不知何時入大內？¹

除了玩賞舊藏古硯，乾隆皇帝也曾帶領匠工仿製澄泥硯。澄泥硯乃陶硯之屬，深為唐宋兩朝士子所熟識，明代盛行端硯，讀書人對於澄泥硯材漸感陌生。乾隆初期，皇帝也不熟悉這類硯材，雖然他在乾隆十六年（1751）曾題詠一方〈宋宣和澄泥硯〉，但是從他的詩文內容看，當時只是玩賞而已，未曾取墨研磨；²即使在乾隆二十年（1755）的活計檔案中也記載當時內廷交出的一方澄泥玉兔朝元硯，隨附一紫檀木盒，皇帝僅傳旨將木盒不平處「收什」，並將裂縫處「走作」，³似仍未使用。

《四庫全書》的編纂，是清高宗很重要的一項文化大事業，除了派得力的文臣主持編纂工程，皇帝也不時親自檢閱收自民間的善本古籍。乾隆四十年夏天，乾隆皇帝就曾命人將謄錄完善的北宋初年張洎（934-997）所記《賈氏譚錄》一書進呈御覽。張洎出仕南唐，任知制誥中書舍人，入宋後擔任史館修撰、翰林學



圖 1-1 宋 文天祥玉帶生硯（《西清硯譜》的訂名） a. 全器、黑漆硯盒與《西清硯譜》入譜題簽 b. 硯面 c. 側視一 d. 側視二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文 000140



圖 1-2 宋 文天祥玉帶生硯（《西清硯譜》的訂名） e. 硯首 f. 硯尾 g. 硯背

士，宋太宗淳化年間（990-994）官至參知政事。他在南唐任官時，曾於宋太祖開寶三年（970）入使宋朝，與宋朝大臣賈黃中（941-996）時相往返，將聞聽於賈黃中所敘的掌故收錄成《賈氏譚錄》一書，書中詳錄了當時在山西絳縣沉絹囊取澄泥的細節：「絳縣人善製澄泥硯，縫絹囊置汾水中，踰年而後取砂泥之細者，已實囊矣！陶為硯，水不涸焉。」⁴

雖然得知從山西絳縣（清代屬絳州）沉絹囊取泥的方法，乾隆皇帝仍缺乏用澄泥硯磨墨的經驗，遂命人取內廷所藏澄泥古硯試用，一試之下，大為滿意，特別作〈澄泥硯銘〉⁵記載磨墨心得，認為澄泥硯「比玉受墨，較石宜筆」。

這時已是乾隆四十年孟秋七月了。這篇硯銘收入《御製文集二集》卷三十九，並且刻在一方「舊澄泥玉堂硯」硯背，署款「乾隆乙未孟秋」，即乾隆四十年七月。這方舊澄泥硯也收入《西清硯譜》卷六，此硯後流落日本。

乾隆四十年是清高宗特別重視澄泥硯的一年，從他這篇〈澄泥硯銘〉的詩註記「朱長文（1039-1098）《墨池編》記澄泥製甚詳」可知，在他試用前述澄泥硯之前，已先知道可在汾水取泥，但是《賈氏譚錄》所記文字雖然較少，所述取泥方法卻更詳盡。

乾隆皇帝讀了《賈氏譚錄》的文字後，不禁興起仿試之心，遂在皇帝的主持下，大學士



圖 2 清 澄泥硃硯、澄泥墨硯、澄泥響月硯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從左至右：故文 001377—洪七一五 16 之一、故文 001378—洪七一五 16 之二、故文 001379—洪七一五 16 之三；乾隆丙申即乾隆四十一年，1776。

6.7 公分，收錄入《西清硯譜》者長為 7.9 公分，餘者長為 7.64 公分（故文 1379）。《西清硯譜》記載澄泥硃墨二方小硯在編輯該書時貯存在懋勤殿，依據這三方小澄泥硯的千字文品號：洪七一五 16 之一至之三（圖 2），或許它們從呈送皇帝御覽並傳旨收貯在懋勤殿後，至民國十三年（1924）十一月末代皇帝溥儀（1906-1967）出宮時仍奔藏於該殿。

巴延三認為沉絹囊取泥之事不甚勞費，可每年造送，於是他便命絳州所屬稷山、河津二縣多置絹囊後，於汾水水流稍緩處，沉囊取泥。至於燒製之法，因當地「久失其傳」，經過兩年也「詢訪未獲」。

從此，備置、恭造澄泥硯材成為山西巡撫每年必須執行的例行公事。每年九月山西巡撫下令兩縣製囊安放，一年後收取澄泥，除了巴延

三外，繼任者如喀寧阿（?-1790，1780-1781任山西巡撫）、雅德（1732-1801，1779-1780任山西巡撫管提督，1781曾短暫出任山西巡撫）、農起（1721-1785，1781-1785任山西巡撫）、福崧（1747?-1792，1786署理山西巡撫）等人皆曾按時呈送澄泥硯材進京。初期（1777-1781）每年呈進十八塊，乾隆四十七年（1782）開始每年呈進二十七塊。山西方面進呈澄泥硯材的檔案除了《軍機檔》、《宮中檔》（圖3）和《方本上諭檔》外，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以下簡稱《活計檔》）中也一再呈現。⁹ 降及乾隆五十一年（1786）九月，十一年來山西所呈進的澄泥硯材已超過兩百塊，足敷應用，加上皇帝對澄泥硯的熱忱似也減緩，遂諭令停止置辦、呈進澄泥硯材。當時署理山西巡撫職的福崧於九月十七日因案革職，在離任前他將當年挑選所得的二十七塊澄泥硯材先行呈送京師，皇帝於十月初六日覽閱後傳旨將這批硯材也發交時任蘇州織造的四德（?-1789，1782-1789擔任蘇州織造）。受命用絳州澄泥成做澄泥硯的蘇州方面內務府外派主事官員前後有舒文（1770-1778擔任蘇州織造）、全德（生卒不詳）、四德和徵瑞

（1734-1815，1789-1791擔任蘇州織造）等人。

當乾隆皇帝開始進行澄泥硯的研製工程之初，內廷造辦處與蘇州方面曾先用內廷舊「磚頭瓦硯」或舊藏澄泥硯改做出新澄泥硯。¹⁰ 初期從山西送到的澄泥硯材可能也就近在京師，甚至是在內廷燒造，由時任內務府總管大臣的金簡（?-1794）主其事，其兄金輝（?-1779）似亦參予，¹¹ 不過當時蘇州地區畢竟擁有多項傳統工藝，同時也曾為內廷改做新澄泥硯，所以當絳州澄泥硯材送達時，也同時送往蘇州交由當時擔任蘇州織造的舒文負責成做澄泥硯。¹² 乾隆四十二年（1777）九月二十二日〈行文〉載錄乾隆皇帝命人同時交出一方「造辦處新做」澄泥菱花式硯和一方「蘇州新做」澄泥虎伏硯，連同一方暢春園撤下的黃石長方硯，一併發往蘇州責成舒文照澄泥虎伏硯一樣顏色做仿舊意青綠色。

其實當時從山西汾水取得的澄泥並不能直接燒製成硯，內廷造辦處硯匠方占吉（生卒不詳）認為絳州新澄泥「性軟」，需加「磁面等毀造，經火可堅硬仿舊」，遂奉准毀造製硯。¹³ 至於蘇州地區用絳州澄泥硯材成做的澄泥硯，雖然成



圖3 清 山西巡撫雅德〈奏為恭進澄泥硯材一十八塊敬謹裝匣進呈事〉 乾隆46年9月25日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宮 065239

器，但是初期似乎並未讓皇帝滿意，因為舒文在乾隆四十三年（1778）回京「陛見」時曾奏報：蘇州成做的澄泥硯之所以堅硬，「係用彼處所出之時（石？）」，皇帝要求必須全用巴延三這次送到的十八塊絳州澄泥硯材成做。¹⁴十月二日旨意發出後，皇帝遂於當月二十九日將蘇州新做的二分澄泥玉兔朝元硯（檔案中皆作「分」，經了解當時澄泥玉兔朝元硯一分為一套，有六方不同形制澄泥硯，統稱「玉兔朝元硯」，另撰文論述）交予懋勤殿「研墨試看」，結果皆「性軟、吊泥」。雖然如此，皇帝仍送交一分絳州澄泥硯材給舒文，並傳旨時在蘇州權理工作的全德將現做未完硯材與新交澄泥硯材「俱要成做堅硬，做得時研墨試看妥」才能送交，結果兩年後的七月初十日蘇州送交的六方大號成套澄泥玉兔朝元硯都「呈進訖」，未再受到質疑。¹⁵在此之前，乾隆四十四年（1779）四月初八日的《活計檔·記事錄》中已曾載錄全德於這年先行呈進一分新做並收什堅硬的澄泥玉兔朝元硯，獲得皇帝認可。

乾隆四十三年，蘇州地區匠役尚未能完全掌握絳州汾水澄泥特性，近鄰薩載（1720-1786）以江南河道總督職署理兩江總督，於當年十二月初九日呈進四方澄泥硯，其中澄泥長方硯兩方，澄泥腰圓硯和澄泥八方硯各一方，其各隨黑漆硯盒，皇帝傳旨改配嵌玉紫檀木盒裝盛。或許這四方澄泥硯尚符聖意，當日就傳旨做一分（六方）玉兔朝元硯木樣，懋勤殿刻得硯銘本文，並新做得澄泥玉兔朝元硯一分（各隨嵌玉刻字硯盒），交薩載成做大小不同尺寸的成套澄泥玉兔朝元硯，俱需刻上硯銘，得時陸續呈進。第二年七月二十八日薩載呈進三分澄泥玉兔朝元硯。¹⁶檔案中未曾指出薩載先行呈進的四方澄泥硯和皇帝傳旨成做的三分成套澄泥玉兔朝元硯之硯材產

地，《活計檔》中也未能覓得將山西置辦的絳州澄泥硯材發交予薩載的紀錄。

然而蘇州方面既能勝任以絳州澄泥硯材製硯的任務，皇帝一方面諭令金輝盤點內廷已經成做的澄泥硯數量，以及安放地點（詳附表），一方面將當年（乾隆四十四年十月）山西送到的十八塊硯材全數發交蘇州織造全德隨意成做澄泥硯。第二年十二月初七日蘇州方面就送到十方澄泥硯，¹⁷但硯之形制，檔案失記。

乾隆四十五年（1780）開始，內廷發交蘇州的絳州汾水澄泥硯材總傳旨成做大小兩種尺寸的成套澄泥玉兔朝元硯。這年十月發交的硯材於第二年五月下旬開始至第三年正月下旬，全德分五批送到成做完成的大小澄泥玉兔朝元硯，每批皆大小各一分，¹⁸每分六方，共六十方澄泥硯。蘇州匠役用絳州澄泥硯材燒成的澄泥硯應讓皇帝相當滿意，乾隆四十六年（1781）五月二十九日第一批成品送達時，皇帝就迫不及待地在六月初八日傳旨全德報告蘇州成做澄泥硯的方法。

這次的問訊不但載入《活計檔》，也見於《宮中檔》和《軍機檔》。¹⁹全德於七月初九日接到皇帝垂詢的旨意後，遂詳加了解，於八月初一日詳細奏報。他說：

內發澄泥性硬，燒造不能成器，是以減用七成，攪和本地澄泥三成，磨細過羅，入水漂澄，做胚陰乾。安置窯中，四面用本地窯器圍繞，燒至一晝夜即可成器。

根據全德的奏報，乾隆朝蘇州地區燒製澄泥硯的全部工序是：

- 一、七成汾水澄泥調和三成江南（南通）江水澄泥。
- 二、將澄泥磨細。

附表 乾隆四十四年四月金輝呈報當時成做澄泥硯情況

作者製表

	乾隆年 / 月 / 日	檔案載錄澄泥硯名	數量	安放、陳設地點	備註
1	41/11/29	澄泥玉兔朝元硯	一分（六方）	香山	各隨嵌玉盒，配得楠木外套匣。
2	41/11/29	澄泥八方硯	一方	附錄硯內	或與《西清硯譜》所錄硯並貯，該書卷 23 頁 17 載錄。
3	42/9/30	大號澄泥玉兔朝元硯	二分（十二方）	圓明園、靜明園各一分	係用「外進澄泥毀做」；各配得嵌玉刻字硯盒；送圓明園者再外配嵌玉竹絲外套匣，送靜明園者再外配素紫檀木外套匣。
4	42/9/30	小號澄泥玉兔朝元硯	二分（十二方）	賞莊親王、咸親王各一分	係用「外進澄泥毀做」
5	42/9/30	大號澄泥石渠硯	二方	圓明園、萬壽山各一方	各隨刻字硯盒
6	42/9/30	小號澄泥石渠硯	二方	圓明園、瀛臺各一方	各隨刻字硯盒
7	42/9/30	澄泥玉兔朝元硯	一分（六方）	香山	蘇州新做，42/12/27 各配得紫檀嵌玉硯盒，再外配黑漆金花罩蓋匣。

資料來源：《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40，乾隆四十二年九月三十日〈行文〉，頁 229；冊 42，乾隆四十四年四月初八日〈記事錄〉，頁 495-496；檔案中所記日期應是金簡處理日期，並非澄泥硯製成或送交時間。

- 三、過篩。
- 四、入水漂澄。
- 五、做成硯形。
- 六、蔭乾。
- 七、置於窯中，四面並用當地的瓷胚圍繞。
- 八、燒一晝夜。

經過這些工序燒製出的澄泥硯並非件件成器，出窯時常有顏色斑雜、色澤深淺不一的情形，更有甚者是破裂不成器。硯匠的說法為：火急則色深，火慢則色淡、斑雜。若遇風雨，窯內受風受濕便致破裂。因此燒製澄泥硯時「必須天氣晴和，火候得宜」時出窯，方始成器。清高宗於九月初六日覽閱全德的奏章時，忍不住硃批：「何不於此等晴和日燒造！」（圖 4）

依據現存《活計檔》，山西呈進的絳州澄泥

硯材發交蘇州負責製造、成做澄泥硯前後十五年（1776-1790，見下文），除了第一年發交的四塊硯材要求成做澄泥虎伏硯，第二年十塊硯材傳旨做幾分玉兔朝元硯，剩餘者做二方放大石渠硯外，第三年的十八塊硯材皇帝傳旨舒文「隨意成做澄泥硯送來，不要俗氣。」（《活計檔·行文》乾隆四十三年十月初二日）乾隆四十四年仍只要求時任蘇州織造的全德將送來的絳州澄泥硯材「隨意成做澄泥硯送來」，翌年十二月蘇州就送達十方形制失載的澄泥硯。就《活計檔》的載錄，除了另有特殊旨意外，乾隆四十五年以後蘇州受命用絳州澄泥成做的澄泥硯總是大小兩種尺寸的玉兔朝元硯，而且是以「分」計數，一分有六方硯。

初期成品於次年仲夏至第三年初春前後分



圖 4 清 蘇州織造全德 〈奏明燒造澄泥硯之做法情形〉 乾隆 46 年 8 月 1 日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宮 064804

五批送達，後來送到時序越來越晚，甚至是收到硯材後第三年初春開始分批交出。每批送到者都是大小成套澄泥玉兔朝元硯各一分，共十二方硯。乾隆四十七年十月收到的硯材於翌年八月初六日成品送到呈覽，剩下六批都是在乾隆五十年（1785）送達，從初春二月底送到當年第一批，最後一批是年底十二月二十八日呈覽；乾隆四十八年（1783）十月發交的硯材於乾隆五十一年初春開始送達，前後十一批，當年年底（十二月二十七日）呈覽最後一批；乾隆四十九年（1784）十月發交者也是在第三年初春開始分兩年共十二批送到，最後一批已是第三年底才送達（乾隆五十二年，1787，十二月二十六日）；乾隆五十年十月發交的二十七塊硯材，也在第三年初春開始送交，第四年底（乾隆五十四年，1789，十二月二十四日）全部完事，但前後送出十三批；乾隆五十一年十月送達京城的絳州澄泥硯材是山西備置、恭造的最後一批，卻是在第三年（乾隆五十三年，1788）九月上旬成品才開始送達內廷，前後分十一次送出，乾隆五十四年六月六日抵達紫禁城時離

內廷發交硯材的時間已超過三十個月。拖得如此長時間，也可側面看出乾隆皇帝對於澄泥硯的研製工程已缺乏熱忱。

此時蘇州方面仍剩有少量絳州汾水澄泥硯材，在乾隆五十四年才接任蘇州織造的徵瑞遂繼續燒造澄泥硯，並於乾隆五十五年二月二十二日和三月十一日分別各送到大小玉兔澄泥硯二分，²⁰ 徵瑞並在第二批送達時強調：「蘇州陸續成做澄泥硯，現因澄泥無存，亦聲明前來。」皇帝於三月二十五日御覽及此，除傳旨將兩分澄泥硯分送二行宮外，並傳旨：「澄泥硯嗣後不必成做。」蘇州織造十五年來用山西巡撫置辦的汾水澄泥硯材成做澄泥硯的任務至此結束。

從乾隆四十年清高宗閱讀《賈氏譚錄》相關文字後，傳諭山西巡撫巴延三照該書所記在絳州汾水濱沉絹囊收取澄泥開始，到傳旨罷停蘇州織造成做澄泥硯的任務為止，長達十六年的做古取泥、做古硯式成做澄泥硯的乾隆朝澄泥硯研製工程，為今人留下不少成品，亦可謂為乾隆朝君臣與匠役的一項科技考古成就！

註釋：

1. 嵇若昕，〈文天祥銘玉帶生硯〉，《故宮文物月刊》，43期（1986.10），頁124-128。
2. （清）高宗，〈題宋宣和澄泥硯〉，《清高宗御製詩文全集（三）·御製詩二集》（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6），卷22，頁4，詩云：「澄泥貢硯識宣和，小篆分明泐未磨；撫不手留質古玉，朕教心澹色春波。出陶底異銅臺瓦，受墨偏宜紫几城；溫室餘閒常命什，救幾惟覺殘（原註：去聲）塵歌。」
3.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冊21，乾隆二十年四月二十四日〈匣棧作〉，頁36。
4. （宋）張洎，〈賈氏譚錄〉，收入《筆記小說大觀》（臺北：新興，1960），編16冊1，謹言：「州縣人」；張洎，〈賈氏譚錄〉，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四十七年文淵閣本影印），冊1036，頁131，作：「絳縣人。」
5. 清高宗〈澄泥硯銘〉云：「欲善其事，先利其器。卅年始用（原註：以乾隆年計之），澄泥習字。曰實疎乎，斯亦有義。初緣弗知，茲知乃試。偶命求之，不脛而至。汾水之泥，墨池之製（原註：朱長文《墨池編》記澄泥製甚詳）。色古質潤，體輕理緻。比玉受墨，較石宜筆。臨池雖助，書法實愧。更予戒哉，玩物喪志。」
6. 嵇若昕，〈乾隆朝澄泥硯的研製〉，《故宮學術季刊》，5卷1期（1987秋），頁57-76。文中頁63-64將首批以山西絳州澄泥硯材燒製的小澄泥硯誤以為是當時「購得的舊澄泥硯材」。
7.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41，乾隆四十三年十月初二日〈行文〉，頁415，作「巴彥三」。
8. （清）巴延三，〈宮中檔乾隆朝奏摺〉，〈遵旨覆奏陸續做造澄泥硯材奴才當遵旨嗣後每年造辦進呈以備文儲摺〉，冊39，乾隆四十二年九月初二日，頁857。
9.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40，乾隆四十二年九月三十日〈行文〉，頁227下-231上；冊41，乾隆四十三年十月二日〈行文〉，頁415；冊42，乾隆四十四年十月初八日〈記事錄〉，頁550；冊44，乾隆四十五年十月八日〈行文〉，頁18下-19上；皆記載著山西送到的十八塊澄泥硯材發往蘇州燒製澄泥硯。冊45，乾隆四十七年十月初三日〈行文〉，頁411；冊46，乾隆四十八年十月十九日〈行文〉，頁650下-651上；冊47，乾隆四十九年十月初六日〈行文〉，頁630下-631上；冊48，乾隆五十年十月初九日〈行文〉，頁270-271上；冊49，乾隆五十一年十月初六日〈行文〉，頁179-180上；則皆記載了送到的二十七塊澄泥硯材發交蘇州織造成做澄泥硯。另，（清）雅德，〈宮中檔乾隆朝奏摺〉，〈奏為恭進澄泥硯材一十八塊敬謹裝匣進呈事〉，冊49，頁52。
10.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38，乾隆四十年二月初二日〈廣木作〉，頁456下-463；冊38，乾隆四十年八月初十日〈熱河隨圍〉，頁807-808上；乾隆四十年九月初一日〈熱河隨圍〉，頁808上；冊38，乾隆四十年十月初二日〈金玉作〉，頁326下-329；冊38，乾隆四十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記事錄〉，頁759。
11.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39，乾隆四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廣木作〉，頁701上，載錄乾隆四十二年六月十六日皇帝傳旨金輝將新做澄泥龍硯「照樣另行毀做」；冊42，乾隆四十四年四月初八日〈記事錄〉，頁495-496，皇帝傳旨「著問金輝成做過澄泥硯共多少方？交與何處安設」。
12.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39，乾隆四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行文〉，頁522，載：皇帝傳旨「向乾清宮要澄泥四塊發往蘇州」；冊41，乾隆四十三年十月二十九日〈記事錄〉，頁352下-353，載：「澄泥二分，二分內一分交金口（簡？）另行燒造，其餘一分仍交舒文燒做，務要堅硬。」
13.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39，乾隆四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廣木作〉，頁699，載十二月十七日紀錄：內廷交出一塊新澄泥硯材，著金簡詢問硯匠是否能照交出的堅硬而帶「舊意顏色」之澄泥石渠硯成做，硯匠方占吉曾詳細說明。
14.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41，乾隆四十三年十月初二日〈行文〉，頁415。
15.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41，乾隆四十三年十月二十九日〈記事錄〉，頁352下-353。
16.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41，乾隆四十三年十二月初九日〈廣木作〉，頁551-552，同日有二則記載。
17.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42，乾隆四十四年十月初八日〈記事錄〉，頁550。
18.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44，乾隆四十五年十月初八日〈行文〉，頁18下-19上，此則檔案之後接續記錄五批送到京城的时间分別是乾隆四十六年五月二十九日、六月初十日、七月初三日、十一月二十七日與乾隆四十七年正月二十六日。
19.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44，乾隆四十六年六月十三日〈信帖〉，頁800下-801上；（清）全德，〈宮中檔乾隆朝奏摺〉，〈奏明燒造澄泥硯之做法情形〉，冊48，乾隆四十六年八月初一日，頁316；（清）全德，〈軍機處檔摺件〉，〈奏為遵旨燒造澄泥硯並將現在做法情形奏明伏乞聖鑒事〉，乾隆四十六年八月初一日，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故機032224，頁1。
20.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52，乾隆五十五年三月初一日〈山東隨圍寄京信帖〉，頁324；乾隆五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山東隨圍寄京信帖〉，頁324下-325上。